



QILU EVENING NEWS

齐鲁晚报

www.qi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冻源大街2号

邮编
250014

传真 (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 (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 (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 (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ilwb



齐鲁晚报微信
qilubanbao002

官员辞职不该是“悄悄的，我走了”

与名人相比，官员的辞职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其实更大一些，毕竟官员在职时手握公共权力，掌控公共资源。我们平常总把官员比喻为公仆，“仆人”突然走了，被服务的公众却不清楚为什么，显然是不正常的。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近期，有关辞职的消息比较多，其中有两种是公众比较关注的，一种是名人辞职，另一种是官员辞职。名人如张泉灵等，离职后大多有剖析心路的告白，引发很多热议。而官员辞职无论职务高低基本都是“悄悄的，我走了”，让群众有“一头雾水”的感觉。

名人辞职为何动静大？首先是名人粉丝多，一举一动都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想悄悄地走也不容易。其次，名人成名不易，大多爱惜羽毛，走就要把走的理由讲清楚，免得传出不靠谱的猜测。官员辞职虽然也会履行既定的组织程序，但是如

果只和组织打招呼，不跟群众作解释，不免让群众感到失望。与名人相比，官员的辞职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其实更大一些，毕竟官员在职时手握公共权力，掌控公共资源。我们平常总把官员比喻为公仆，“仆人”突然走了，被服务的公众却不清楚为什么，显然是不正常的。

马云曾经总结员工辞职的原因：第一，钱没给到位；第二，心受委屈了。公务员辞职或许有其特殊性，但是能自愿放弃众人艳羡的位置，原因也不外乎物质和精神的诉求。有些官员虽然奔着薪水更高的岗位去了，但是因为羞于谈钱，索性闷不吭声地走。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只会让公众感到虚伪，因为以合法的形式追求财富并不可耻。还有些官员也许只是感到自己不适合从政，希望在辞职后开辟新的事业，又不

愿因自己的离去给组织添麻烦。这都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能对公众解释清楚，不仅不会受到非议，反而能起到示范作用，引领更多的人人尽其才，为社会增加活力。

官员辞职向公众做个解释，不仅是做人的礼节，也是政治伦理的要求。官员不是一般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被人民赋予权力。这是一种事实存在的委托关系。官员辞职就是要主动解除这种委托关系，就应该对权力主体有所解释。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尤其应该重视辞职的严肃性。2009年，重庆市时任市长王鸿举也曾任届期满自愿辞去市长职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王鸿举当时亲临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现场宣读辞职报告，讲明了自己辞职的三个原因，获得了在场人大代表的多次掌声。这样的辞职不仅让官员走

得一清二楚，也让权力交接有始有终，如果公众看到的只是“放了一个假，市长不见了”，又怎能不让人胡乱猜测。

官员“说走就走”，对公众连个像样的告别都没有，深究起来原因不一，从根源上来说还是权力观出了偏差。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官员拿到这个权力就应该心生敬畏，用权时要认真，交权时也应当真。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回答何时辞职的问题时说：“为说对的话认错、写检讨或停播节目，就是我辞职的时候。”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职业看得很重，心中有不容践踏的底线，果真到了他需要辞职的地步，想必他对自己的观众会有很清楚的交代。如果辞职官员们对自己的权力也能如此珍视，他们中的很多人大概也不舍之如敝履，挥一挥挥手就走了。

谨防“官方专车”阻断改革之路

公民论坛

刘鹏

9月16日，“首汽约车”APP正式上线。与现有专车多使用租赁车或私家车不同，该平台提供的预约车辆均为政府许可的出租营运车辆，且全部挂有京B出租车牌照，驾驶员持有从业许可证，也被称为“官方专车”。据悉，这些车辆均为中高端轿车，车辆起步价和每公里收费均高于出租车。（9月17日《京华时报》）

出租车行业出现供不应求等运营弊病，于是民间“专车”应运而生。可是“专车”刚一抬头，即被当作非法营运的“黑车”遭到打压。民间“专车”何去何从尚没有一个说法，“官方专车”却又“横空出世”。乍一看，这是官方调整经营策略，满足不同需求的经营求变。但仔细想想，其间又难免有一些让人不解与纠结的东西：比如运营模式的“抄袭”嫌疑，比如垄断经营的“换汤不换药”。

显然，“官方专车”并不是对行业垄断的破袭，更像是对出租经营垄断的加剧。与民间“专车”不同，

“官方专车”依然是由相关公司统一经营甚至是独家经营的，虽然取消了“份子钱”等，司机由经营者变身“上班族”，但经营收入80%以上归公司所有。这样的经营方式，于提升司机积极性、提高服务水平与质量、促进行业发展等来说，明显是作用有限，甚至是毫无作用的。

而且，“官方专车”采取高价经营方式，不仅起步价和每公里收费均高于出租车，而且一上车即扣起步费，没有了起步价内可走3公里等设计，同时增加了服务时长费。长此以往，“官方专车”无疑将会成为少数高收入群体的“专车”，成为出租车行业的VIP，很难真正“接地气”，更难受到普通乘客的欢迎。

“专车”的出现，其最大的功能或者说乘客的最大期望，显然在于打破垄断，倒逼行业改革，提升行业整体服务水平。但北京市所出现的“官方专车”，却没有实现这些功能，甚至在经营模式等方面，仍旧“换汤不换药”。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以差异化命名的“官方专车”一旦推广，很可能以一种全新的垄断经营，取代曾经的垄断经营，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之路，恐怕也会因此中断。

息、最可靠的数据，从而打捞出最真实的底层声音。（摘自《新京报》）

市民是否绿色出行 取决于城建理念

“9·3”阅兵之后，北京迎来了交通最拥堵的一周，北京开始向市民倡导绿色出行。毫无疑问，绿色出行是全世界应对交通拥堵的公共法宝，然而对北京绿色出行，却难免让人有一种滑稽感。

一个城市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并不完全是由个人的意愿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城市的建设理念决定的。如果道路建设以汽车为中心，那么这个城市的人一定会选择开车的方式出行；如果以人为中心，绿色出行也一定会成为出行首选。归根到底，绿色出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出行方式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城市建设和道路建设理念能否回到尊重人，尊重人的路权，尊重人的基本需求上的问题。

倡导绿色出行，如果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时髦口号喊一喊，当成一个权宜之计让人少开两辆车，那意义不大。相反，如果把绿色出行作为检验我们城市发展和建设理念的标尺，那倒更值得我们深思。（摘自《法制日报》，作者叶泉）

■本版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王昱

9月12日，新华社旗下“瞭望智库”刊发了署名罗天昊的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评论。对李嘉诚内地撤资行为，该文认为，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来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其撤资行为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得最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很久没有见到一篇网文能够引起人们如此的震动了，这份震动是双层的。首先，它将“李嘉诚跑路”这个不算新的消息旧事重提，在中国股市持续震荡的当下，这则旧闻对于国人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打击还是有那么一点的。也许正是顾虑到这一问题，16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都不得不进行回应。表示“各项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惠及更多的外来投资者，而且一系列的改革成效在陆续显现。”

有了官方回应，再加上李嘉诚的长和集团那篇信不信由你的辟谣声明，公众对于经济的担心好歹得到了交代。

然而，相比经济焦虑，更让不少人担心的其实是这篇文章的口气。“别让李嘉诚跑了！难道不是‘打土豪’，恍如隔世，让人想起岁月当中一些经典桥段。”《北京商报》的评论打趣说的。的确，以现代而非三十多年前的眼光看来，《别让李嘉诚跑了》犯了不少常识性的错误，正如《三湘都市报》所指出的：“只要李嘉诚没有违法违规，任何人都没有‘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权力——投资贸易自由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比于纸媒的温文尔雅，网络媒体对于该文的批驳显得更加不客气，红网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不讲事实和逻辑是要流氓》不留情面地指责称：但凡有些常识，就可以发现罗天昊的论调，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哪里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哪里有更好的生财空间，资本就会流往哪里，它只会顺从逐利本性，而不是其他。罗天昊用商业原罪、社会责任来论证“李嘉诚不能跑”，显然有点荒唐走板。

资本自由，商业逐利。这些观点本身当然没有问题。然而，在中国国内这个特殊环境下，“义利之争”是公众始终绷紧的一根弦。李嘉诚这么撤资，到底算不算不爱国，算不算忘恩负义。这其实才是罗天昊一文始终被揪住的小辫子，也是公众解不开的心结。赚了我们这么多年钱，李嘉诚对国家这么没感情吗？这也许才是不少人真正想问的。

对于这一点，《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号侠客岛显得很达观：“让商业的商业化，这是市场化的真意，也是政府的最佳选择。把‘感情’放在前头，就会发生，招来企业的时候，不问好不好，盲目立项，你给我充面子，我给你甜头尝。出了问题，企业赖政府，哎呀，为了地方献爱心，他们定要拉郎配。政府一摊手。心是赤诚的，想法是天真的，后果是预料不到的。”

相比之下，环球网一篇《走吧，不要绑架李嘉诚》，把良心这事儿说得更透，“从道德上来看，李嘉诚的这种行动似乎有点背信弃义，但对于一个商人来说，首先需要遵守的是法律，而不是商业道德。舆论要求李嘉诚完成‘三大使命’，但无论是‘回报穷人’，还是‘稳定香港’，还是‘做更多善事’，这都是政府的本分，而不是商人必须完成的法律义务。一个商人不愿意从事这‘三大使命’，或者说他在这些方面有过努力，现在收缩了，那是他的自由，没有必要用道德、信义之类的绳索来绑架他。”

李嘉诚要走，拦也拦不住，既然如此，不妨显得达观一点，反躬自省。在这方面，《华商报》的总结很值得一听：把李嘉诚撤资放置于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视角下考察，这种铿锵有力的声音，比逼着人家屁股后面指手画脚更加务实、理性……其实，没必要揪着李嘉诚的跑与不跑，我们欢迎企业“来”，也尊重企业“跑”的权利，但更要创造一个让企业“不想跑、不愿跑、舍不得跑”的市场环境。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李嘉诚要走，法律管不着，道德治不了。但如果这位亚洲富豪的背影，给中国留下的是一份反思而不是出于激愤的指责，这无疑意味着我们的国家朝着真正的成熟又前进了一步。

舆论场

嘉诚别走

在这个经济格局剧烈变动的时代，一些实业家从国内撤资“跑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如果有谁的“跑”能惊动中国舆论场，乃至惊动中央政府，那还是很值得围观的。本周，这样一个话题确实出现了，被关注的“跑路者”是李嘉诚。而比其“跑路”更受关注的，却是声讨其“跑路”的那篇文章。